



一個理論旅行的學術史考察

——馬克思主義登陸中國後的傳播

陸揚

(復旦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登陸始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萬國公報》對英國社會學家本傑明·頓德《社會進化論》的中譯，譯稿易名為《大同學》。雖然李提摩太和蔡爾康的譯文與頓德的原文多有差異，但馬克思的學說正是在此新舊交替時代被引入近代中國的文化語境的。三年後，梁啟超《進化論革命者頓德之學說》一文中再次提及馬克思，但認為頓德較馬克思“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然而，隨着其後蜂起的對日本社會主義著述的大量中譯，馬克思在中國的形象很快清晰起來；尤其是《社會主義神髓》書中對馬克思主義系統的介紹，不但闡述了社會主義從烏托邦走向現實、從狂熱走向科學的必由之路，而且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認知以及《資本論》中的剩餘價值學說都有涉獵闡解，進而使馬克思從“百工領袖著名者”確立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雖然在20世紀的最初十年，馬克思主義中國之旅的起點階段尚流於解釋世界的啓蒙，訴諸改變世界的革命實踐還有待時日，但它卻在苦難中國的改良主義知識語境中播下了一顆火種，這顆火種不久即燃成燎原之勢。

[關鍵詞]馬克思 《大同學》 頓德 社會主義

[作者簡介]陸揚（1953—）男，上海市人，文學博士，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藝學、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德里達：解構之維》、《死亡美學》、《中世紀文藝復興美學》、《歐洲中世紀詩學》、《日常生活審美化批判》、《後現代文化景觀》等。

Title: The Eastern Reception of a Western Theory: How Marxism Initiates Its Chinese Journey

Abstract: The earliest recep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so far as we know, seems to be Timothy Richard's fragmental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enjamin Kidd's *Social Evolution*. In 1899, it was published in *The Review of the Times*,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Three years later, Liang Qichao mentioned Marx again in his essay "The Theory of Kidd, An Evolutionist Revolutionary." According to Liang, Kidd's evolutionism is a remedy better than Marx's socialism. However, the image of Marx was getting clear in the wake of a massive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socialist works, among which Kotoku Shusui'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is imminent for its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and how socialism goes from utopia to reality. Generally speaking,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the Chinese journey of Marxism in a large part remains an enlightenment of interpreting the world. It needs time for Marx to subvert the treacherous Chinese reality indulged then in all kinds of reformism.

Keywords: Marx, *Science of Datong*, Kidd, Socialism

Author: Lu Yang is a PhD in Literature. He is currently the Professor and doctoral tut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Fudan University.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是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紛至沓來的各種主義、思潮、觀念，有的被接受，有的被實踐，有的被改造，有的被批判。這裏無意對西學東傳的命運做總體考量，祇是想以馬克思主義最初在中國的傳播作為研究視角，觀察一個西方學說是如何被東方受眾所接納，並且最終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

一、《大同學》的原初語境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登陸，可以追溯到一部譯作《大同學》的刊佈。該書最初連載於1899年（清朝光緒二十五年）2月至5月《萬國公報》的第121至124冊。

在這一時期，由於中國渴求維新變法，展望未來，似乎莫不言“大同”。所謂“大同”，《禮記·禮運》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同”即是人類公理。康有為（1858—1927）直到1913年纔首次將其《大同書》甲部與乙部刊於《不忍》雜誌，而最初的書名即是《人類公理》。“人類公理”是戊戌變法前後的知識界如飢似渴探求不息之鵠的，由此形成近代中國西學東漸的第一波熱潮。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波熱潮背後的推手，主要不是經由政治的和經濟的直接渠道，而是基督教文化。

《萬國公報》的前身是傳教士主辦主編的週刊《教會新報》，清同治七年（1868年）創刊，同治十二年（1873年）易名為《萬國公報》，光緒九年（1883年）停刊。光緒十五年（1889年），《萬國公報》復刊，由兩年前成立的教會出版機構——上海廣學會主辦，週刊改為月刊。《大同學》即是《萬國公報》復刊之初鼎力推介的一部作品。這裏，西方傳教士們的篳路藍縷之功不可埋沒。事實上，《萬國公報》也是近代中國介紹西學內容最多而且影響最大的刊物之一。

《大同學》的原本是英國社會學家本傑明·韻德（B. Kidd, 1858—1916, 今譯為“基德”）所著的《社會進化論》，1894年由麥克米倫公司在倫敦和紐約出版。19世紀末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達爾文主義盛行，《社會進化論》明顯受其影響。作者竭力鼓吹赫伯特·斯賓塞（H. Spencer, 1820—1903）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通篇以“進步”（progress）



《萬國公報》

《大同學》



與“進化”（evolution）並提，即為一例。在頡德看來，社會進步體現生物學的進化原則，與理性無關。甚至無所不在的宗教，其功能也無非在於引領個人行為，使之服膺於社會進化或者說進步的利益。而說到底，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以其天生具有的最高社會效率，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世界的統治力量。《社會進化論》在當時廣有影響，不但在本土英國，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廣有回應。在今天看來，19世紀末葉在英語世界介紹馬克思的學說，是為該書的一大亮點。

《萬國公報》上連載的《大同學》，係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 Richard, 1845—1919）節譯《社會進化論》的前三章內容，由《萬國公報》的華文主筆蔡爾康（1851—1921）用文言文敷出。清光緒十六年（1890），李提摩太在廣學會的創辦人韋廉臣（A. Williamson, 1829—1890）去世後，接替主持上海廣學會的日常工作。這位在中國度過四十五年傳教生涯、算得上是康有為、梁啟超之輩精神導師的英國人，一力支持洋務運動，與清政府的關係也相當密切。他多次上書新政，一度被光緒帝（1871—1908）聘為顧問大臣，後來又成為慈禧太后（名杏貞，1835—1908）實際上的外事顧問。

1899年5月，《萬國公報》的東家——上海廣學會印行《大同學》全本，李提摩太撰寫了“序言”。全書十章的標題譯文和原文分別是：（一）今世景象（The Outlook）；（二）進境（Conditions of Human Progress）；（三）相爭相進之理（There is no Rational Sanction for the Conditions of Progress）；（四）人世第一大事（The Central Feature of Human History）；（五）大道關係於興世（The Func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六）泰西教化[上]（Western Civilization）；（七）泰西教化[下]（Western Civilization）[continued]；（八）今世養民策（Modern Socialism）；（九）教化本於道心非出於學術（Human Evolution is not primarily Intellectual）；（十）總結（Conclusion）。

對照這個譯名章目，可以見出西學東漸初期鮮明的精英文化意識。翻譯即便是一手傳一手又傳一手，就像林紹（1852—1924）那樣同原本之間還有一層中介，也能做到融會貫通、觸類旁通。例如，將今譯“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譯作“大道”，“社會進化”（evolution of society）譯作“興世”，“社會主義”（socialism）譯作“養民策”，“intellectual”譯作“學術”等等。可以說，這是在日語中的漢字譯名全面登陸之前，中國接受西學的原生態譯筆，值得充分重視。

文中涉及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使之第一次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應是見於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即1899年2月《萬國公報》第121期上《大同學》第一章中的一段話：

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於君相之範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誠恐遍地球之財幣，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係富家權盡之時。何也？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復無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權，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當此內實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無講安民新學者，以遍拯此垂盡之貧傭耳。^①

這段話在本傑明·頡德《社會進化論》中的語境，是言當代社會兩極分化，一方面是資本聯手，組成辛迪加等壟斷同盟，另一方面則有社會、工會和勞工聯盟。但是，這一勞資分化、階級分化的趨勢，早有馬克思預言在先。事實上，通覽《社會進化論》第一章，言及

^① [英]本傑明·頡德：“大同學”，《萬國公報》121（1899），李提摩太譯，蔡爾康撰文。

馬克思僅有一處，全文如下：

但是，卡爾·馬克思及其弟子們不僅已經預見，而且已經給我們描述了這一景象。他們說，這不過是我們社會自然發展大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步驟既可預見，其目的也勢在必然。工人被奴役被壓迫與日俱增，階級意識日益覺醒，且針對公敵組織起來，這一切不僅波及社群，而且超越國界，正是我們期望有日的現象之一。他們說，另一方面，我們必然同樣樂見大資本家繼續併吞小資本家，直到隨着財富聚集到少數資本巨頭手裏，社會最終對生產的無序狀態忍無可忍，變革的自然過程必須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告終結，而將生產資料轉化為國家財產。在這之後，他們說，我們必須展望將來，廢除所有的階級差別和階級對抗，在社群中消滅剝削階級，使個人不再為生存而苦苦掙扎。^①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李提摩太和蔡爾康所譯的《大同學》相關章節，對本傑明·頓德的原文基本上是提綱挈領、擇要轉述了。頓德對馬克思的理解，是馬克思堅信，隨着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無產階級終將終結資本無序競爭狀態，奪取政權，實現生產資料國有化，創造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平等社會。不僅如此，頓德注意到馬克思主義正在形成，是以有“馬克思及其弟子們”之說。而李提摩太和蔡爾康的轉述，則有“任其蔓延日廣，誠恐遍地球之財幣，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係富家權盡之時”，窮黎必“不出其自有之權，用以安民而救世”，正是言中了無產階級取代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必然趨勢。

但是，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李提摩太和蔡爾康的譯文與頓德的原文其實還多有差異。首先，原文中“馬克思及其弟子們”的間接敘述，被轉移到馬克思一人名下，而且變成直接敘述。其次，馬克思這段話的開端“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於君相之範圍一國”，為頓德原著所不見。所謂“糾股辦事之人”是言資產階級，由此我們可以比較《共產黨宣言》中那一段著名的話：“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②很顯然，資產階級權柄籠罩五洲，突破君相之民族國家範圍這些表述，其來源並不是頓德的《社會進化論》或者說《大同學》，而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該《宣言》作為單篇文獻，無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廣布的著述，發行量之廣大迄今無出其右者。早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談到《宣言》已在德國、英國、美國至少印過十二種不同的德文版本。1850年，第一個英譯本在倫敦面世；1871年，至少又有三種不同的英譯本在美國出版。李提摩太鼎力傳播西學，對這篇劃時代的革命文獻肯定是相當熟悉的，以至於譯事言及馬克思，馬上就想起《宣言》揭示的這一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且將之移植到頓德《社會進化論》的譯介之中。當此之時，中國正目睹了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血雨腥風，李提摩太或者期待清政府能夠多接受西方新進思想，促進改良佈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馬克思的學說正是在這一新舊交替的轉折關口，被引入了近代中國的文化語境。

二、從進化論到社會主義

中國本土作者第一次談到馬克思，當是梁啟超化名“中國之新民”刊於改良派喉舌

^① 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4), 3.

^② [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卷，第35頁。

《新民叢報》第十八號上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此時距《大同學》全書刊佈已經過去三年。當然，誠如標題所示，梁啓超這篇文章鼎力推舉的是本傑明·頡德，而非馬克思。



马克思



本傑明·頡德

文章開篇便說，20世紀揭開帷幕，年餘之中名人著述、鴻篇巨製多有面世，但是能夠獨闢蹊徑、卓然成一家之言，且影響被及世界與將來者，必推頡德的《泰西文明原理》。梁啓超對頡德情有獨鍾，固然非空穴來風，然而包括1902年出版的《泰西文明原理》(*Principl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在內，頡德後期著作影響力最大的還是他在1894年一鳴驚人的《社會進化論》。2009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再版

了此書，足見它對於當時社會的反思並非就是明日黃花。頡德的社會進化論理論淵源主要來自斯賓塞和馬克思——從斯賓塞那裏，他讀到物競天擇的達爾文主義；從馬克思那裏，他讀到了階級鬥爭。但是，頡德對斯賓塞和馬克思都不以為然，反之卻寄希望於基督教的心靈教化。認為唯其如此，社會纔可望在一片愛的祥和氣氛中，步入正途。頡德同樣反對社會主義，認為未來社會將為個人才情的發展提供極大空間，故而競爭將發生在個人中間，而不是在集團中間。而社會主義呼籲平等，其結果只能是助長低層階級的惰性，讓社會變得毫無生氣，失去競爭力。很顯然，在馬克思主義成為主導意識形態之前，頡德的這些思想對於暮氣沉沉的貧弱中國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因此，梁啓超就認為，頡德與馬克思比較，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雖然，以斯賓塞之睿智，創“綜合哲學”，自謂借生物學之原理，以定人類之原理，而其於人類將來之進化當由何途，當以何為歸宿，竟不能確實指明，而世界第一大問題，竟虛懸而無簿。故麥喀士（日爾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學者，以科學破宗教，謂人類乃由下等動物變化而來。然其變化之律，以人類為極點乎？抑人類之上，更有他日進化之一階級乎？彼等無以應也。”赫胥黎亦曰：“斯賓塞之徒，既倡個人主義，又倡社會主義（即人群主義）。然此兩者，勢固不可以並存，甲立而乙破，乙立而甲破。故斯氏持論雖辯，用心雖苦，而其說卒相消而無所餘。”此雖過激之言，亦實切當之論也。雖然，麥喀士、赫胥黎雖能難人，而不能解難於人。於是頡德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初著一書，名曰《人群進化論》，以解此問題。^①

這是“馬克思”第一次進入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的敘述系統。它的背景不是別的，依然是本傑明·頡德《大同學》的社會進化論。

人們看到，梁啓超將馬克思與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並提，認為兩人雖然言語過激，但是對於社會進化論有補偏救弊的鏡鑒之功。祇是比較頡德這位今日已經很少有人提起的英國學者，馬克思和赫胥黎還是顯得功虧一簣。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這一回用《人群進化論》來對譯頡德的《社會進化論》，沒有沿用此書三年之前《大同學》的

^① 梁啓超：“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新民叢報》18（1902）。

中譯名。“馬克思”的譯名，也轉換成一個更具有本土色彩的名字“麥喀士”。這是不是意味着梁啓超的馬克思敘述另有來源？即是說，考察從《大同學》到《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這一從遜譯到敘述的馬克思最初的中國之旅，中間是不是還存在一個迄今尚未發現的迷失環節？

從梁啓超的轉述來看，馬克思在當時中國的知識視野中，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當仁不讓的代表人物。如果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論、國家論、人民論、民權論等等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它鮮明的階級鬥爭意識。一如《大同學》中之所言，“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復無之”，除了奮起反抗外，別無他途。梁啓超在文中援引頡德的話，再一次提到馬克思時，引人矚目的也還是階級衝突：

今之德國，有最佔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之個人主義（尼志埃為極端之強權論者，前年以狂疾死，其勢力披靡全歐，世稱為十九世紀末之新宗教）。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之劣者鉗制。^①

尼志埃即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這一回是將馬克思與尼采並論，一樣是重申強與弱、優與劣的社會兩極分化。但是很顯然，梁啓超更願意認同頡德的評價，所謂二者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目的皆在現在，而未能展望將來。換言之，獨有頡德鼎力鼓吹的社會進化論，不但切中時弊，而且可為將來所用。這裏梁啓超已經相當嫋熟地在使用“社會主義”這個從日本轉道而來的“socialism”的漢語譯名。在“養民策”、“人群主義”等名稱相繼流行過之後，“社會主義”終於塵埃落定，替代“進化論”而成爲約定俗成的“天下大同”之學的名稱。

這一時期“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譯介、傳播，並且蔚然成風，與日本正在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之旅主要是假道日本的見解和引介。馬克思成爲舉足輕重的劃時代人物，經歷了一個不斷清晰的過程。例如，馬君武（1881—1940）1903年2月15日發表在《譯書彙編》第二年第十一號之上的《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開宗明義就說，社會主義發源於法國人聖西門（C. Saint-Simon, 1760—1825）、傅立葉（C. Fourier, 1772—1837），中興於法國人路易·勃朗（L. Blanc, 1811—1882）、蒲魯東（P. J. Proudhon, 1809—1865），極盛於德國人拉薩爾（F. Lassalle, 1825—1864）、馬克思。換言之，社會主義的內涵和外延較馬克思主義要廣泛得多，它並不是馬克思的專利。這很大程度上也是先行一步，接受西學的東鄰日本影響使然。

就目前可以找到的材料來看，從梁啓超刊佈《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的1902年到1904年這三年之間，中國至少出版了八種譯自日文的推介社會主義的專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東京大學英語教授村井知至（1861—1944）所著的《社會主義》一書。村井知至是1898年成立的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會會長。此書應是社會主義日本化的一個碩果，被認爲是日本第一部真正的社會主義文獻。作者本人是一位基督教徒，所以不奇怪全書十章篇幅中，第九章的標題就是“社會主義與基督教”。作者說，基督教歷來與社會主義水火不容，互爲仇讐，但那祇是近代的貴族基督教所爲，基督教的原初形態則非如此。所以，既然聖西門寫《新基督教》一書時，搜剔古代基督教精義，論證可與社會主義相合，那麼，他以自己的切身體驗，也很願意將古代的基督教精神與近代的社會主義兩相互勘。由此，

^① 梁啓超：“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新民叢報》18（1902）。

村井知至列出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七個相似點。它們分別是：（一）理想與目的皆為人類平等與社會協同；（二）傳道熱心相似；（三）同遭社會迫害；（四）傳播之迅速也不分彼此；（五）同為世界的思想；（六）同樣同情貧民；（七）同樣富於兄弟友愛精神。正是在第五點“同為世界的思想”一段中，村井知至將視宗教為鴉片的馬克思引為同道。作者的論述是，猶太教非常頑固，思想所及止於一國，非猶太人不得入其教。但是，基督教大開門戶，創立之初即傳到異邦，成為世界的運動。社會主義無疑同樣有此世界情懷：

故卡爾氏主倡此主義，組織萬國勞動者之同盟會，其綱領有曰：“吾党無國種之區別，惟依真理正義道德以立此主義，以期傳於萬國。”^①

上文中的“卡爾氏”即卡爾·馬克思，“萬國勞動者之同盟會”指的是“第一國際”；引申其綱領的一段話，無疑是本於馬克思1871年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的一段話：“協會宣佈：加入協會的一切團體和個人，承認真理、正義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和對一切人的關係的基礎，而不分膚色、信仰和民族。”^②這裏，馬克思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主倡領袖。而宣傳基督教社會主義，可視為日本這部宣傳社會主義的開山之作一大特色。

村井知至的《社會主義》係由羅大維編譯，上海廣智書局出版，扉頁上印有“光緒壬寅三月初版”，是時為1902年4月。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出版的第一部系統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譯著，雖然其中對馬克思還是一言帶過，未有專述。

三、馬克思主義的系統介紹

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系統介紹，出現在1903年面世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中。此書原為日本的福井準造所著，1899年由有斐閣出版。1903年，上海廣智書局將通力譯介西學的趙必振（1873—1956）的譯本分為上下兩冊，鉛印綫裝出版。這不但是後來中國，

也是其時日本第一部系統介紹社會主義來龍去脈及在各國發展綫索的厚實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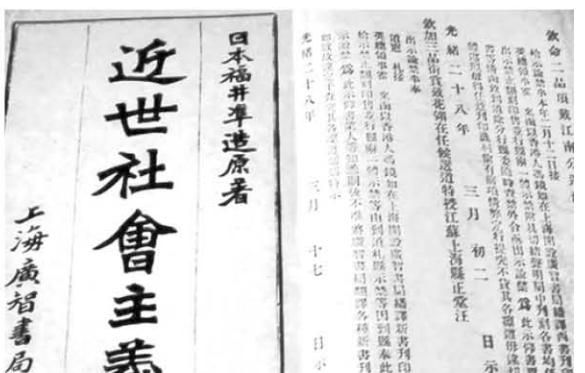
《近世社會主義》全書長達五百頁，分為四編，分別介紹巴貝夫（F. N. Babeyf, 1760—1797）、聖西門以降的法英“第一期社會主義”，德國馬克思、拉薩爾為代表的“第二期社會主義”，以無政府主義等為代表的“近世社會主義”，以及社會黨為主角的“歐美諸國社會黨之現狀”。在第二編“加陸·馬陸科斯及其主義”

的第一章，對馬克思及其學說作了專門系統的介紹。“馬陸科斯”即馬克思，是書恩格斯（F. V. Engels, 1820—1895）的譯名則為“野契科斯”。很顯然，這是比較典型的吳方言譯名：“恩”、“昂”、“野”的發音大體可以相通。作者說，法國的第一期空想社會主義，不過自家一人假定，立論根基與原理原則鮮有深入說明。但是，馬克思考察德義正道與資本歷史，進而與當代制度資本相比較，而究經濟學理與歷史事實，而成自家學理前提。是以“德意志之社會主義，既已如斯，其學識之深遠，其思想之精緻，與從來之社會主義者，大異其趣”。^③雖然該書在敘述馬克思生平時，注意到恩格斯是馬克思“有力之同

^① [日]村井知至：《社會主義》（上海：廣智書局，1902），羅大維譯，第9章。

^② [德]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卷，第227頁。

^③ [日]福井準造：《近世社會主義》（上海：廣智書局，1903），趙必振譯，第2編，第1章，第1節。



《近世社會主義》

志”，兩人始終同甘共苦，而且提及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但還是毫不含糊地將德國社會主義的創立之功歸於拉薩爾和馬克思名下。作者說，拉薩爾是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發起人，其名最是顯赫。又說，馬克思確立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寫出無二之經典，而聞名於世。這些“無二之經典”中，居功至偉的不消說是《資本論》。事實上，《近世社會主義》介紹馬克思的學說，通篇就是在談《資本論》。誠如斯言：

加陸·馬陸科斯創設社會主義之實行，與國際的勞動者同盟以期社會之雄飛，其學理皆具於《資本論》，大聳動於學界，為社會主義定立確固不拔之學說，為一代之偉人。其學理與主義，吾人不能不進而採之耶。^①

《近世社會主義》應是在中國第一次系統介紹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相關學說。作者告訴讀者，馬克思的《資本論》開啓了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傳統。它不同於以往那種大多屬於架空妄說、博取虛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而是考察資本的起源與歷史變遷，以說明當今世界的經濟結構全然是為資本所支配。這一切，都毋庸置疑地顯示對中國前途的直接考量。1903年3月，由康有為、梁啟超創辦，流亡橫濱的梁啟超本人遙控主持的廣智書局，還在《新民叢報》第二十七號上刊登《近世社會主義》的出版廣告，開宗明義指出此書關係中國前途者有兩端：一是此書言歐美各國勞動問題，有最詳備之解釋，對於中國不可限量的工業發達前景尤可為借鑒。二是中國的組織黨派尚處在幼稚時代，宗旨混淆；尤其社會黨與無政府黨不好分辨，容易混淆耳目，故此書解析何以社會黨為世界所歡迎，無政府主義乃世界所厭惡，亦有直接鏡鑒意義。故而廣智書局鼎力推介：“即此兩端，此書之價值可知，有志者請急先睹。”

關於《資本論》的介紹，《近世社會主義》以這樣一段話作結：

馬陸科斯其著《資本論》，於解釋資本之性質，果斷定其正當之資本為掠奪之結果與否，尚未定之問題。彼非但舉排斥之議論以攻擊現時之社會制度者，彼亦鑒於前者社會主義之通弊，徒倡荒唐無稽之暴說，馳於空理，流於空論，不顧社會之大勢如何，單訴人間之感情，而計劃社會組織之改革者可比。若資本家之專橫壓抑，大背正理正道者，亦未嘗企圖社會制度之改革。此前者之通弊也。馬陸科斯之所以絕叫社會之改革，企圖勞民之改善者，以認識夫正道與正理，以公平之權利，為正當之要求，以分與一切之人民。非如彼狂奔於社會問題，徒激發人心以鼓舞社會，而博一時之虛名，其事業倏忽而可解散者。故彼所採之社會改革者，非僅就其面目，必以學理為社會主義之根據，以攻擊現社會，以反對現制度。而創立新社會主義，以倡導於天下，舍加陸·馬陸科斯其人者，其誰與歸？^②

很顯然，《近世社會主義》這部廣智書局大力推廣的譯著，可謂在中國第一次系統介紹了歐美各家各派社會主義及馬克思學說。馬克思已經當仁不讓成為舍我其誰的新社會主義領袖人物。比較起來，以往聖西門以降的空想社會主義是馳於空理、流於空論和情感主義，不顧社會大勢、不識社會制度之改革必然。反之，馬克思呼籲社會改革，聲張公平正義，提出剩餘價值學說來解釋階級鬥爭之必然，以推翻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為己任。這一切，無疑都是顯示一個革命新時代的到來。

這個新時代或許應當叫做“科學社會主義”。這一點在1906年由達識譯社翻譯、《浙江潮》編輯所出版的《社會主義神髓》中已見端倪。該書1903年7月在日本初版，作者是社

^{①②} [日]福井準造：《近世社會主義》，第2編，第1章，第2節。

會主義活動家中江兆民（1847—1901）的學生幸德秋水（1871—1911）。該書說，近年出版的許多社會主義著述和譯本，大都出於非社會主義者之手，往往陷於獨斷和片面，所以他竭力要剔除枝葉，凸顯社會主義的大綱和要旨。這個大綱和要旨，毋寧說即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作者交代，寫作此書用了八種參考文獻；前三種便是今日社會主義的第一經典：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第一卷、《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幸德秋水的這本《社會主義神髓》雖然祇有七章，加上短短的自序，不過是一個小冊子；但此書在日本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初期傳播史上影響深廣，特別是該書參考了三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有逐一引述。例如，在題為“產業制度之進化”的第三章，開篇就說：

社會主義之祖師凱洛·馬爾克斯者，為吾人道破所以能組織人類社會之真相，曰：“有史以來，不問何處何時，一切社會之所以組織者，必以經濟的生產及交換之方法為根底。即如其時代之政治及歷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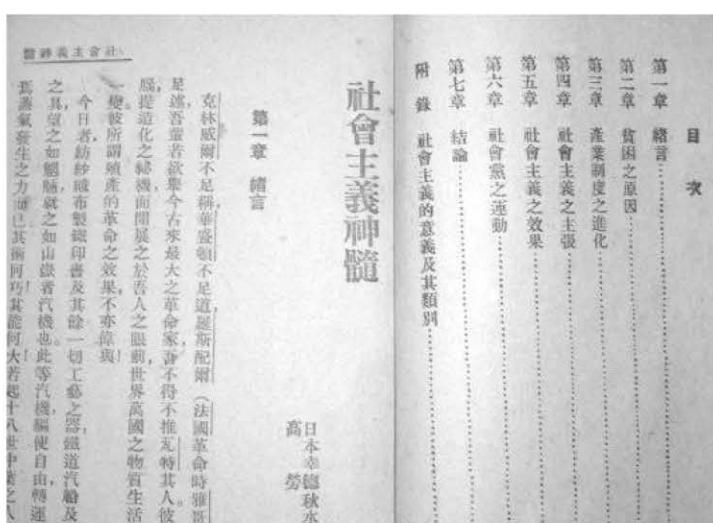
這是將馬克思視為新一代社會主義的開創人。緊接着的引文，則出自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作者以這段話揭示人類社會組構的真相所在，故對此的闡釋是，人生必先滿足衣食需要，然後方有暇從事美術、宗教與學術。這顯然是沿承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所說的馬克思兩大發現之一即是揭示社會生活物質基礎的觀點。

該書又引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的一段話，重申一切社會變化及政治革命，其根本原因不是出於永恆之真理和正義，毋求之於哲學，但見之各時代之經濟。關於經濟如何作用於社會發展，作者基本上復述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的著名內容。他指出，中世紀本無資本家和地主，唯久之時易市變，分散的小規模的生產資料集中起來，漸

漸成為現代產業的基礎。故美洲的發現，好望角的回航，東印度的貿易，中國的市場，必推動生產方式演變，使其從地方成為全國，從全國成為世界之有。同樣，階級鬥爭，勞資矛盾，是為自由競爭的必然產物。對此，作者介紹了馬克思的另一主要發現：剩餘價值。指出，“馬爾克斯蓋謂：交換之時，決不生價格；價格之創造，決非在市場。彼等資本家所以厚其資本者，唯從勞動者掠奪此‘剩餘價格’”。 “價格”為日語原文所用語詞，中譯本係直接移用。總而言之，社會主義的神髓就在於完成了從空想到科學的必由之路。作者說，19世紀有歐文（R. Owen, 1771—1858）、卡貝、聖西門、傅立葉、路易·勃朗、魏特林（W. Weitling, 1808—1871）這一批社會黨人，指責現實制度非不痛切，理想非不高尚，然是時社會主義發達猶淺，偏於狂熱和空想。近世社會主義者，實從死灰中再燃也：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馬爾克斯與其友音蓋爾同發表《共產黨宣言》，詳論階級戰

^① [日]幸德秋水：《社會主義神髓》（東京：《浙江潮》編輯所，1906），達識譯社譯，第3章。



《社會主義神髓》

爭之由來及其要終，並謂萬國勞動者同盟以來，社會主義儼然成一科學，非若舊時之空想狂熱也。^①

作為日本明治時期水平最高的社會主義著述之一，《社會主義神髓》對馬克思主義應是有了一個系統的介紹。它以《共產黨宣言》為科學社會主義誕生的標誌，不但闡述了社會主義從烏托邦走向現實、從狂熱走向科學的必由之路，而且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認知，以及《資本論》中的剩餘價值學說，都有涉獵闡解。這也是此書後來一譯再譯，一版再版，流傳廣泛的原因。僅在達識譯社的譯本推出四年之間，就分別在日本印行了1906年和1907年兩個新的中譯本。前者為蜀魂譯，東京中國留學生會館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後者為創生譯，東京奎文館書局出版。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上海的《東方雜誌》連續五期，刊登了由該雜誌主編杜亞泉以筆名“高勞”重譯的這本《社會主義神髓》，此為該書在上海第一次刊佈。而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則是八年之後的事情了。高勞譯本，後來收入“東方文庫”叢書，192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49年後，北京商務印書館又將此書收入“漢譯名著”叢書；1963年，又出版了馬采的譯本。從《社會主義神髓》上述蔚為大觀的漢語傳播史來看，應稱得上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初傳播階段中，一個令馬克思的中國形象日漸清晰，從“百工領袖著名者”到確立為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里程碑。

綜觀以上從《大同學》到20世紀最初十年的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學說中國接受史，我們可以發現：首先，上海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登陸中國最早的港口，而且也是此一時期中國譯介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重鎮。這與上海作為近代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有直接關係。它不但在西學譯介及出版發行方面具有其他省市望塵莫及的得天獨厚條件，而且培育了近代中國第一支產業工人隊伍。對於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從階級鬥爭到剩餘價值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即將成為遠東第一都市的上海，具有天然的親和性與接受土壤。其次，假如說基督教會和英國因其政治、宗教和文化上的多種原因，成為馬克思學說進入中國的最早渠道，那麼，隨着近代日本走向西化及熱情傳佈社會主義，以及中國留日學生、學者日衆，使日本很快替代歐美，成為20世紀初葉向中國傳輸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渠道。這一轉向，與辛亥革命的醞釀有直接關係。最後，雖然此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傳播流於解釋世界的啓蒙，訴諸改變世界的革命實踐尚且有待時日，但它卻是在新舊世紀之交苦難中國的改良主義知識語境中播下了一顆新的火種，這顆火種不久即燃成燎原之勢。

[編者註：該文為作者承擔的中國社科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研究”（11BS016）的階段性成果。]

^① [日]幸德秋水：《社會主義神髓》（東京：《浙江潮》編輯所，1906），達識譯社譯，第6章；[日]幸德秋水：《社會主義神髓》（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馬采譯，第38—39頁。